

凌廷堪傳

王章濤 著



揚州學派叢書 趙昌智 主編

廣陵書社

YangZhouXuePaiCongShu-LingTingKanZhuan

凌遲堪傳

王章濤 著



揚州學派叢書

趙昌智 主編

廣陵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凌廷堪传 / 王章涛著. — 扬州: 广陵书社, 2007.8
ISBN 978-7-80694-228-4

I. 凌… II. 王… III. 凌廷堪(1755 ~ 1809)—传记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9277 号

书 名 凌廷堪传
著 者 王章涛
责任编辑 胡 珍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附二楼 邮编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扬州市府西路 8 号 邮编 225009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228-4/K·113
定 价 28.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如印装错误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凌廷堪像

凌廷堪字仲子又字次仲安徽歙縣人父業實先生六歲而孤母王氏鬻簪珥使就塾家益困年十三棄讀書不成復讀書著辨志賦自勵遊揚州慕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全綜亭學主目為奇人總惠入都翁覃溪先生見其著述大異之尊為時文使應試不第復遊揚見阮文達公以學問相益擬太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乾隆五十四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成進士授知縣改就教職選甯國府教授先生之學無所不窺博覽強記貫通羣經而尤深於禮不輟寒暑二十餘年著禮經釋例十三卷潛心於樂謂今世俗樂與古樂中隔唐人燕樂一闕蔡季通鄭世子輩俱未之知因著燕樂考原六卷論古文以駁遲為正執詩則不分唐宋但論其變以元遺山為宋濂一大宗歷主敬亭紫陽諸誨席遠近學者悉以所學就正嘉慶十三年母王太孺人年九十無疾而終先生哀毀青一目明年卒於家年五十有五所著除禮樂三種外有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謠二卷劉託六卷晉秦始留律二卷一奏元樂新書二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均行世

扬州学派丛书序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史上，清代学术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在我国，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有清二百六十八年，主流学术是以经学为核心的朴学。扬州学派，则是清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朴学流派之一。

在《清史稿》和《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扬州学派朴学家得以立传者有汪中、汪喜孙、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江藩、阮元、焦循、朱彬、刘台拱、刘宝楠、刘恭冕、凌曙、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等三十余人。如果把该学派扬州籍先驱者和异地成员计算在内，则远不止此数。在清代学术诸流派中，群星璀璨臻于此境者，殊为罕见。

十八世纪扬州学派之兴盛，实非偶然。除了清代中叶全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学术趋于繁荣这个大背景之外，与扬州区域经济、文化的特定条件亦密不可分。

在清代，扬州是全国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说：“扬州地势平衍，民性纯善，四野之民业农，四郊之民业圃，沿江各洲之民业商，傍海之民业渔盐，自昔以富庶称者以此。”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勤劳、智慧的扬州人民创造了异常丰厚的物质财富。清代扬州的支柱产业，一是盐业，一是运

输业。在乾隆年间，仅“淮盐正课”一项上缴国家的银两即达四百万两之多。所以，当时人曾经感叹：“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两淮盐法志》）而运输业，据《钦定户部漕运全书》记载，自顺治年间开始，通过扬州转输的漕粮多达三百二十万石左右，约占全国漕运量的八成。盐运，在全国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额。发达的区域经济，是扬州文化事业发展的保障。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记载：“两淮盐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咸得肄业。”当然，区域经济对文化事业的支撑，绝非只此一端。

扬州还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其学术渊源之深远为世所公认。西汉董仲舒曾任江都相，其思想在当时和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亦开创扬州一地之学风。隋唐扬州籍学者曹宪、李善研究《文选》，形成了名震京师、影响及于全国的“文选学”。南唐广陵人徐铉、徐锴兄弟校正《说文解字》，援引精博，小学家罕能及之，被学界称为“大小徐”。宋代海陵人胡瑗精通经学，开理学之先声，并以富有新意的“苏湖教法”显著地影响了全国的文化教育。安定书院之命名，寓有纪念和继承这位先贤的美意。

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扬州学派才可能在清代跃然问世。

扬州学派在许多方面都有卓越成就。传统的经学研究，以清代为总结阶段。阮元主持编纂的《皇清经解》、《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于综理经学文献，推动朴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中华书局精选清人十三经注疏二十四种，其中扬州学派的著作有六种，占四分之一。这不妨作为评估扬州学派经学成就的一项指

标。传统小学，以清代为高峰。戴震、段玉裁、高邮二王为其杰出代表。尤以高邮二王在诂释古代虚字等方面的成果与方法，影响深广，即便在现代也被学者奉为主臬。诸子学在乾嘉以后走向复兴。汪中研究《墨子》、《老子》、《荀子》及贾谊《新书》，见识卓尔不群，开风气之先。扬州学派在文学、史学、地理学、数学、金石学等方面的实绩也斐然可观。王国维通观有清一代学术，尝谓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晚清之学新。证之扬州朴学家之事实，这是不刊之言。

独特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渊源，赋予扬州学派鲜明的学术特征，概而言之，就是张舜徽先生所说的“通”字。这种“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讲究训诂考据与义理的贯通。扬州学派学者把考据训诂视为治学的根柢、通经的桥梁，他们反对臆说，使用朴学的方法，对古书旧义作有条不紊的组织，实现文字训释的融会贯通，对经籍的诠释作出巨大贡献。二是坚持“道”与“艺”兼重。扬州学者求为“通儒”，其重大成就和突出长处，在于不仅致力于发明古经之本义，还大力发明和发扬早期儒家重视实用之学的传统。阮元轻看“世之习课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推崇顾炎武以“经史”之学统“经济”之学。汪中之为学，视野开阔，经学、文学之外，兼擅史学、文献学、舆地学；焦循著《加减乘除释》等数学著作、《李翁医记》等医学著作、《北湖小志》等史地类著作、《花部农谭》等文艺类著作；阮元著《畴人传》，系统记载天文算法方面的科技人物和创造发明，都具有自觉的致用意识。三是重视“日新”，反对“据守”。为时代变化所感，扬州学派学者多具有注重发展变化的理念。焦循无论是阐明性理、讨论经学，还是教诫弟子，都经常强调事物之变化不居、前进不止。他不

独对古人之说不轻信盲从，对当时学术界以考据、汉学、宋学相标榜的习气，也予以尖锐批评。

自清末以来，学术界对扬州学派的研究未曾中断。有学者统计，自1900年至1993年，已刊的扬州学派研究论著多达四百余篇（部）。最近十年，扬州学派研究愈加活跃。海内外都有高校和研究机构立项研究扬州学派，海峡两岸多次开展学术交流，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扬州市和扬州大学的专家学者还发起成立了扬州学派研究会。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深入研究扬州学派的积极意义愈加彰显。其一，研究扬州学派求真务实、通经致用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其在促进中国学术风气转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正确认识扬州学派应有的学术地位，完整把握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二，扬州学派学术成果众多，但是利用远远不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文献藏之深闺，世所罕见，深入发掘、研究扬州学派文献，无疑有益于促进学术事业的繁荣。其三，扬州学派学风优良，笃志博学，躬行实践，求同存异，不事张扬，展开对扬州学派的深入研究和普及宣传，有助于矫正今日学坛浮躁之气，对学人为学，乃至对政要为官和普通百姓为人，不无启迪。其四，海内外学界对扬州学派研究具有很高的热情，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共同做好扬州学派研究这篇大文章，有助于促进学术交流，扩大城市影响，提升城市形象。

目前，扬州学派文献整理与出版工作虽已取得可观的成绩，已经刊行的扬州学派代表性论著有数十种，这是开展研究的良好基础。但是依然存在诸多不足：扬州学派不少文献绝版已久，稿本、抄本未经刊行者尚多。已经出版的文献，以收入大型丛书影印出版者居多，学者购藏、利用均有不便。经过整理的文献，还存在校点

不密等缺陷。总之，扬州学派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离系统、完善的目标，犹属任重道远。这种状况，势必制约扬州学派研究的推进，对于扩大扬州学派学术的传播尤为不利。

有鉴于此，我们筹划整理、出版《扬州学派丛书》。本丛书包含清代扬州学术名家的文集、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评传和扬州学派研究论著三大部分。其中，学术名家文集初步拟订书目如下：王懋竑集、朱泽沄集、陈厚耀集、新编汪中集、王念孙集、王引之集、任大椿集、刘台拱集、江藩集、阮元集、焦循集、凌廷堪集、黄承吉集、凌曙集、陈奂集、刘文淇集、刘宝楠集、汪喜孙集、陈立集、柳兴恩集、朱彬集、刘恭冕集、成蓉镜集、刘毓崧集、刘寿曾集、刘师培集。在上述各家中，王懋竑、朱泽沄等人不是“隆汉贬宋”规范意义上的朴学家，但是，他们作为扬州学者，在学行与学风方面都是本地后学之楷模，因此不拘汉宋而收录其文集。凌廷堪、陈奂、陈立、柳兴恩虽非扬州籍学者，与扬州学派诸大师却存在学统相承的关系，因此不拘籍贯而收录其文集。其人物评传亦拟同此。研究论著则以新成果为主。这样确定书目，其利弊得失如何，欢迎学界同道讨论、赐教。为节用人力、物力，对上述各家文集，已有辑录较为完备、校点较为精当的文本问世的，暂以存目方式处理。

应邀参加《扬州学派丛书》整理、编著工作的群体，主要由扬州大学和扬州市的专业人员组成。其中有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老一辈专家，也有基础扎实、勤奋好学的中青年学者。系统地搜集、整理扬州学派文献，并与海内外同道协力推进扬州学派研究，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创造灿烂的当代文化的过程。我们深信，在整理研究扬州学派文献的实践中，认真总结、吸取前人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掘、利用前人的研究成

果，必将有力地促进当代扬州学者群体发展壮大和学术事业欣欣向荣。

历史正在向前发展。今天的扬州，正处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速期。扬州地区经济建设的进步，为扬州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日趋优越的条件。包括学术文化在内的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扬州社会的文明进步也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扬州是饮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让扬州的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无论是从文化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看，扬州的传统文化都是建设新时代文化名城的重要资源。因此，整理扬州学派文献，研究扬州学派，钻研的虽是古书，从事的却是面向现实和未来的全新事业。

赵昌智 田汉云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日

序 言

凌廷堪是清代扬州学派乃至整个清代学术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这在学术前辈的著作中是有定论的。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戴震受学于江永，亦事〔惠〕栋以先辈礼。震之在乡里，衍其学者〔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翬、春乔——等。”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并时皖儒如程易畴〔瑶田〕、金槃斋〔榜〕、凌次仲〔廷堪〕辈，皆笃嗜名物数制之学。”

钱穆先生也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梁著不同之处在于以学术代表人物依次登场，共分十四章，列为正传的17人，附传34人。第十章，正传为焦里堂、阮芸台、凌次仲，附传为许周生、方植之。由此可见扬州学人之地位，可见凌廷堪之地位。

当代徐复先生在《扬州学派新论·序》中更明确地肯定：“凌廷堪以歙人居扬州，与焦循友善，阮元问教于二人，遂别创扬州学派，声誉因以崛起。”

凌廷堪的学术地位是由其学术成就确定的。乾嘉时期学人十分重视“礼学”。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说：“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仲尼燕居》：‘子曰：礼也者，理也。’《乐记》：‘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与理本一贯，然礼必证诸实，合于礼者是，不合于礼者非。是非有定，人人共信者也。理常凭于虚，彼亦

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无定，不能人人共信者也。”他把清人研究礼学的成果作了一个总的概括，大致是准确的。其实，“以礼代理”的发动者、推行者当数以阮元、焦循、凌廷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而尤以凌廷堪的作用和贡献为最大。凌廷堪治经，最精于礼，著有《礼经释例》十三卷，“将全部《仪礼》拆散了重新比较整理贯通一番，发现出若干原则。其方法最为科学，实经学界一大创作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校礼堂文集》有《复礼》三篇等专论，则阐述了其礼学思想，主要观点有：

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复礼》上）

夫人有性必有情，有情必有欲。……圣人知其然也，制礼以节之，自少壮以至耆耄，无一日不囿于礼，而莫之敢越也；制礼以防之，自冠昏以逮饮射，无一事不依乎礼，而莫之敢渎也。然后优柔灰炆，徐以复性，而至乎道。……夫舍礼而言道，则空无所附；舍礼而复性，则茫无所从。盖礼者，身心之矩则，即性道之所寄焉矣。（《荀卿颂并序》）

义因仁而后生，礼因义而后生。……后儒不知，往往于仁外求义，复于义外求礼，是不识仁且不识义矣，乌睹先王制礼之大原哉！（《复礼》中）

《论语》记孔子之言备矣，但恒言礼，未尝一言及理也。……其所以节心者，礼焉尔，不远寻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节性者，亦礼焉尔，不侈谈夫理气之辨也。……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盖求诸理必至于师心，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也。（《复礼》下）

从上所引，可见凌廷堪旨在提倡和推行“以礼代理”，这在清

代中期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变革，其影响是巨大的。诚如钱穆先生所言“同时学者里堂、芸台以下，皆承其说，一若以理礼之别，为汉宋之鸿沟焉”，礼学的兴盛成为清代汉学取代宋学的重要标志。直至晚清学者如黄以周、孙诒让等，仍以礼学为治学的重点。

凌廷堪精于治经，也善于治史。其挚友江藩就称赞他说：“近时讲学者喜讲六书，孜孜于一字一音，苟问以三代制度、五礼大端，则茫然矣；至于潜心读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先进之中惟钱竹汀、邵二云两先生，友朋中则李君孝臣、汪君容甫及君三人而已。”凌廷堪“无史不习，大事本末，名臣行业，谈论时若瓶泻水，纤悉不误。地理沿革，官制变置，《元史》姓氏，有诂之者，从容应答，如数家珍”（江藩《汉学师承记·凌廷堪》卷7）。他虽无史学专著，但文集中论史诸篇，则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比如他把少数民族政权放在与汉民族政权同等位置上来讨论，不为“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所束缚，撰《十六国名臣序赞》，为二十位少数民族杰出人物唱赞歌，是有史胆史识的；他坚守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治史学风，写下了《隗嚣论》、《汉顺帝论》、《两晋辨亡论》等大批论文，钱大昕读《后魏书音义序》，称赞“可谓观书眼如月，具眼人定不拾人牙后慧，为之快绝”；他对谱牒学、乡土志也颇有兴趣，极具才识，尤以为元好问作谱，以诗考史，以史证诗，既可称之为谱中特例，亦开以诗考史之先河。他在史学上的标新立异也有“过”的地方，就是把对宋学的不满扩大到宋人治史领域，甚至企图为臭名昭著的秦桧翻案，这就不能为人所理解和容忍了，因此遭人诟病则是必然的了。

凌廷堪多才多艺，写的一手好骈文，填的一手好诗词，还擅长天算、乐律诸学，著有《燕乐考原》、《梅边吹笛谱》等。他之所以到扬州来，一个重要的机缘就是当时两淮巡盐御史奉命置词曲

馆，他应聘来扬当词曲校讎的。《凌廷堪传》对传主有着较为详细的介绍，恕不赘述。

凌廷堪的学术地位不仅因为其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与其在学术传承中的作用有关。凌廷堪生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25岁时到扬州检校词曲，与汪中、阮元等相识交游。对凌廷堪来说，“乾隆四十六年，游扬州，慕其乡江慎修、戴东原两先生学”，也就是说，扬州那种“家家贾马，人人许郑”的浓烈学术氛围，深深吸引了他，感染了他，使其受益颇多。包括他的史学观点，也受扬州影响不小。乾隆四十五年（1780），24岁的凌廷堪曾在仪征杨氏书肆借得吴志伊《十国春秋》，精读一遍，如得百朋，入词曲馆后又得见总校黄文暘所撰《通史发凡》，其治史兴趣大概即肇始于此。扬州学人亦交好并服膺凌廷堪。汪中生于乾隆九年（1744），大凌13岁，阮元生于二十九年（1764），小汪20岁，小凌7岁。他们交游有一段趣话：“忆甲辰岁，阮伯元詹事方弱冠，余偕之访君〔指汪中〕，君与谈论，颇折服，越数日治具招焉。伯元畏其好骂，谢不往，君深恨之，遂成讎隙。然每与余论及当代学人，终为伯元屈一指也。呜呼！即此可见君之虚怀好善，非徒以谩骂惊世骇俗者矣。”（凌廷堪《汪容甫墓志铭》）因为谈得投机，才会“治具招焉”；阮元因为年轻，对汪有敬畏之心，诚惶诚恐，才采取“谢不往”的态度；“每与余论及当代学人”，大有煮酒论英雄的味道；“终为伯元屈一指”，“可见君之虚怀好善”，说明汪中、阮元、凌廷堪相知甚深。凌与焦循直接交游所见著录不多，但从两人的书信交往以及以后见面的情况看，两人应是相互心仪的。凌在两代学者之间无疑起了桥梁作用。乾隆四十七年（1782）秋，词曲馆撤销，凌廷堪解职返乡，尔后至京师闯荡。所幸结识翁方纲，得其指点赐教，翁方纲先生授以《戴氏遗书》，此时去戴震卒后已

六年，这无疑是在凌廷堪学术生涯中又一个重要转折。在《谢翁覃溪师赠戴氏遗书启》一文中可隐隐看出乾嘉学派渐趋大统、扬州学派进入转换期之端倪。次年，凌致翁方纲函，推荐汪中、阮元，称汪中“研经论古，偶及篇章”，阮元“学问识解俱臻极诣，不独廷堪瞠乎其后，即方之容甫、郑堂，亦未易轩輊”。把尚在弱冠之年处于备考阶段的阮元等与京师学坛、学界主流进行对接，这对推动扬州学术研究以至形成继吴、皖之后又一个高峰，功不可没。凌廷堪虽非扬州人，但入赘广陵华氏，学术起始于扬州，与扬州诸多学人关系密切，学术风格也相互接近，所以他不但属于扬州学派，而且是开派人物之一。

问题是，清代扬州学派中如此一位重要人物，在一个较长时期却不为人所关注、重视。凌廷堪可谓是生前蹭蹬，身后寂寥。由此也折射出包括凌廷堪在内的扬州学人的优秀品质。扬州城池历史上曾几度兴盛又几度衰败，政治经济地位或重或轻，世事难料，面貌多变，而不变的是城市的学习风气，是读书人的清高气节。扬州学派人物颇多困于陋巷的经历，如汪中、江藩、焦循等，皆能安贫乐道，在逆境中求知，于寒苦中著述，不厌不疲，乐在其中。凌廷堪也是如此。他6岁而孤，家境贫寒，年12弃书学贾。年过20，亟思发愤读书。30岁后始习举子业，中了进士。他却放弃任知县的机会去作宁国府教授。因贫病，53岁即过世了。如此命运，令人扼腕叹息。但他们却甘之如饴，没有因为生活贫困、衣食不周动摇潜心问学的决心；没有因为身处山林、困于一隅而束缚自己的学术眼界；没有因为地位低下、身份卑微而降低自己的高尚人格，“不为利疚，不为势诎，是真先圣之功臣，晚世之志士”（清李慈铭撰，由云龙辑《越縕堂读书记》）。这正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的地方。建立新扬州学派需要这种精

神。因此，重视对凌廷堪的研究，出版《凌廷堪传》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王章涛先生十数年来孜孜不倦，锲而不舍，为彰显扬州学派勤奋努力，继撰成《阮元传》后，又陆续推出《阮元年谱》、《阮元评传》、《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等专著，今又看到其新著《凌廷堪传》清样，我为他的刻苦精神所感动，为他的累累硕果而高兴，故乐而为之序。

赵昌智

二〇〇七年七月三日灯下